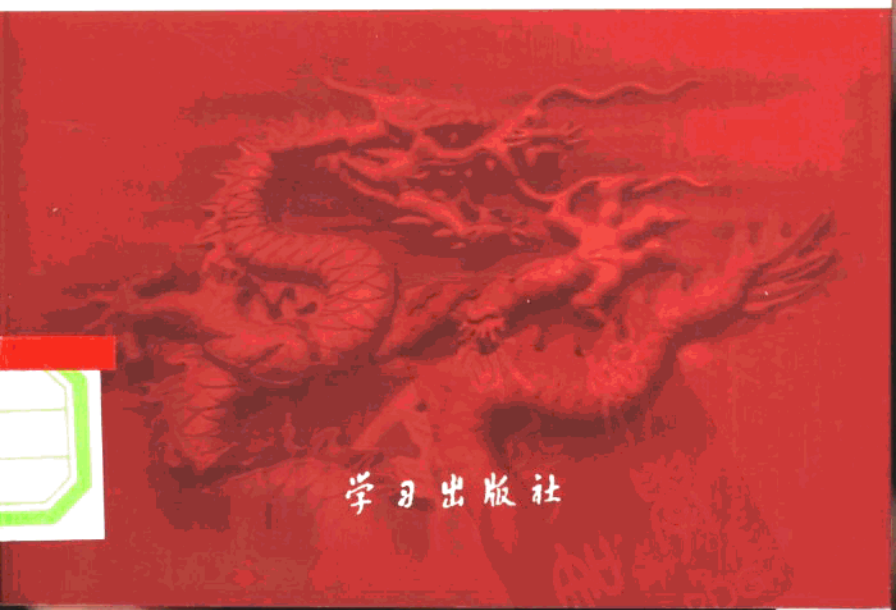


中國

本书编写组

百年

ZHONGGUOBAINIAN



学习出版社

中国百年

责任编辑：冰冰



中国百年

装帧设计：缪惟



目 录

一、八国联军进北京：中华民族

在屈辱中进入 20 世纪	(1)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1)
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7)
改良派的变法维新	(13)
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进北京	(18)

二、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民主

共和国方案的破产	(24)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4)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 革命活动	(27)
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32)
清王朝的覆灭与军阀混战的开始	(38)

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43)
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	(43)
五四运动	(47)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53)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57)

四、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寻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62)
第一次国共合作	(62)
大革命的高潮和北伐战争	(65)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	(68)
工农武装斗争的开始和农村 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	(71)
红军长征	(77)

五、抗日战争：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

外来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84)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84)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全国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形成	(88)
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全民族抗战	(94)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00)

六、人民解放战争：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	(108)
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	(108)

国民党发动内战	(114)
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	(123)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29)

七、新中国诞生：开辟中国

历史的新纪元	(132)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国人民 共和国的建立	(132)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136)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各项 民主改革	(142)
祖国大陆的统一和抗美援朝	(149)

八、“一化三改”：社会主义

制度的基本确立	(154)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 计划的提出	(154)
农业的合作化运动	(160)
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165)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	(173)

九、全面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的初步探索	(176)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176)
“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 失误	(183)

国民经济调整和全面建设的成就	(193)
十、“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	
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01)
“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201)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204)
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212)
曲折中的发展	(216)
十一、改革开放：走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218)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218)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	(220)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225)
政治体制改革	(237)
“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的推进	(242)
十二、继往开来：满怀豪情	
迈向新世纪	(248)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	(249)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253)
跨世纪的发展战略	(257)
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迈向新世纪	(261)
后记	(264)

一、八国联军进北京：中华民族 在屈辱中进入 20 世纪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 半殖民地的深渊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从 17 世纪开始，西方日渐强大，中国则日趋衰落。

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日趋尖锐。资产阶级除了对内加紧压榨本国工人外，开始对外疯狂侵略和扩张。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中国，由于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自然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掠夺的对象。

1793 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向清政府呈递国书，请求清政府允许英国商人除广州外可以在天

津、宁波、舟山等地通商，在北京建立使馆，在舟山附近取得一小岛作为停歇、收存货物之用等等。当时的清政府仍然坚持传统的藩属观念，把马戛尔尼当作“英吉利贡使”接待了他，对他“优厚礼待”，但对英国政府的要求，一项也没有答应。马戛尔尼回国行前，乾隆给英国国王两道“敕谕”，对英使的问题答复如下：

关于派使者驻北京，“断不可行”。理由是与天朝体制不合。“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

关于通商，实无必要，因为“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至于在天津、宁波、舟山等处通商事，因“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卖货物。况该处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兹多未便”，所以“皆不可行”。

关于要取得一小岛作为停歇、收存货物之用一事，“尤不便准行”，因为“天朝尺土俱为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

这样一来，马戛尔尼出使的目的，除了递交了一份国书外，其余什么都没达到。乾隆皇帝的回信实际上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宣言，它既体现了清政府维护主权的坚定立场，又表现了清政府“惟我独尊”的自大心理。而清政府所奉行的这种“关门”主义，恰好与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谋求打开中国门户，要求“自由”通商是针锋相对的。清政府的“关门”政策显然不符合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所以，当西方殖民主义者试图突破这一限制，强迫与清政府建立所谓“平等”的商业性的伙伴关系时，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首先以商品来轰击中国的大门。但在中国却遇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最顽强的抵抗。从1786年起，他们开始推销棉纺织品，因价钱贵于中国的土布，无法竞争，造成多次亏本。相反，中国出口的茶叶、生丝、药材等，却在英国畅销。鸦片战争前近70年里，按中英之间正当商品的进出口贸易计算，除少数几年外，中国对英国的正常贸易每年还保持出超二三百两白银的优势。

英国资产阶级用工业品打开中国大门的方法，没有成功，于是便采取更卑劣的手段——向中国倾销鸦片。从19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其中一部分属于美国、葡萄牙）急剧上升。1800年为4570箱，1838年达40200箱，增加了将近8倍。中国从贸易出超国变为入超国，每年外流白银约500万两。鸦片贸易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是一本万利，但对于被毒害的中国，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大量白银外流，造成百业萧条、国库空虚，使本已停滞的封建经济更加衰败；鸦片贩子大量行贿，使清王朝的吏治更趋溃烂；更严重的是吸鸦片烟者，到1838年已超过200万，不仅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甚至驻防旗兵、绿营兵丁也都手握烟枪，吞云吐雾。

对于鸦片泛滥，中国广大人民是切齿痛恨的。清政府亦曾三令五申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但是由于外国鸦片贩子的走私与行贿，这种禁止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到鸦片战争前夕，统治阶级中出现了严禁与弛禁两种主张。道光帝于两者之间，举棋不定。1838年6月，黄爵滋（鸿胪寺卿）上疏道光，第一次提出以死刑重治吸食的主张。这一奏折被传谕各省督抚议奏。在复奏的28份奏章中，琦善（大学士、直隶总督）、伊里布（云贵总督）等20人反对，只有林则徐等8人赞成。

林则徐（1785—185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年间进士。他痛感鸦片流毒中华造成民穷、兵弱、银涸的恶果，在其湖广总督任内严禁吸食鸦片，成效显著。1838年7月至9月，他三次复奏道光，极力赞同黄爵滋的主张，并大声疾呼：“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兵和饷是清朝统治的命根子，林则徐的话击中了要害，使道光下决心采纳严禁鸦片的主张。12月下旬林则徐奉旨抵京，8天中被道光连续召见8次，并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厉行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责令外国烟贩缴出鸦片，并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在广东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下，终于迫使义律（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和英美烟贩缴出鸦片237万多斤。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率领地方官吏，在虎门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当众销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维护民

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坚定决心。

1839年8月，中国禁烟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成立一个“伦敦九人委员会”，并组成了包括刚从中国逃回的大鸦片贩子查顿在内的三人核心小组，密谋发动侵华战争。9月下旬，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正式报告，首相巴麦尊当即表示对中国惟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接着，伦敦、利物浦、里兹等大城市的资产阶级也大叫大嚷，主张立即发动对华战争。1839年10月1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中国出兵。1840年2月，英国任命好望角舰队总司令乔治·懿律为侵略军总司令和谈判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为副代表。4月，议会在经过辩论后，以9票多数通过了支付军费案，支持政府进行可耻的对华战争。6月，由16艘军舰、4艘武装汽船、28艘运输船，以及4000多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结果中国战败，1842年8月29日中英两国在南京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共13款，其主要内容有：（1）中国开放“沿海之广州、福州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2）中国“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3）中国向英国赔款“银数共贰千壹百万元”；（4）协定关税，凡英国商品“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餉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5）在赔款未付清之前，“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

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1843年7月和10月，中英两国又先后在香港和虎门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规定：（1）“倘遇有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2）中国“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这便是后来“租界”的起源；（3）中国将来“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所谓的“最惠国待遇”。之后，美、法、俄等国也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攫取了除割地、赔款外的所有特权。

《南京条约》及其后两年中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五口通商，中国被动地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割让香港，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协定关税，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又使中国受制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所宣称的那种“平等”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中国开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一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

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 侵略的斗争

鸦片战争的失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一个“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开始发生变化，一部分封建士大夫成为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他们大胆揭露社会矛盾，提出改革方案，研究边疆史地，了解世界大势，筹划抵御外侮，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林则徐提出了“开眼看世界”的主张，魏源则呼吁统治者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当时的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整个社会没有丝毫改革的迹象。

与此同时，西方殖民势力却不满足于它在鸦片战争后所掠取的权益。最初他们企图通过“修约”的形式迫使中国全境开放通商，并允许它们在北京设立使馆，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于是他们决定通过武力来达到目的。1857年英法两国分别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组成联军远征中国。12月，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结果被俘。随后侵略者继续北上，1858年5月攻陷大沽、天津。咸丰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6月26日和27日，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1）英、法两国公使驻京，与清政府往来用平等礼节；（2）中国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

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3) 外国人可以赴内地游历、通商、传教；(4) 修改税则；(5) 对英国赔款 400 万两，对法国赔款 200 万两。之后，侵略者退出天津，并定于次年再来北京换约。咸丰皇帝对公使驻京及内地游历等款极为不满，打算用全免关税和弛禁鸦片来换取那些条款。这种争其所不当争，放弃其所不当放弃的做法，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者对外部世界及外交事务的无知与愚昧。

1859 年 6 月，英法两国带兵到天津，准备赴京换约。他们拒绝按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在北塘登陆进京，而是蛮横地要从大沽口入京，遭拒绝后，竟以军舰攻击大沽炮台。大沽守军奋起抵抗，击退了侵略者的进攻。1860 年春，英法两国组织一支更加庞大的侵略军到达中国，4 月占领舟山，5 月侵犯大连，6 月占领烟台，8 月攻占大沽、天津，直逼北京，9 月联军进犯通州，八里桥失守，清军退至京师城下，咸丰帝逃往热河，命令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向侵略者求和。10 月 6 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0 月 24、25 日，奕訢被迫与英法代表签订了《北京条约》，这个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外，还规定：(1) 开天津为商埠；(2) 准许华工出国；(3) 割九龙司给英国；(4) 交还法国在华天主教教产；(5) 赔偿英、法军费各 800 万两，恤金英国 50 万两，法国 20 万两。

在英法联军侵华战争期间，美、俄两国也以“调停”为名，行侵华之实。特别是俄国，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中俄《璦琿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

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利益外，还从中国夺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经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人仍然顽固不化，极端的守旧和排外。另一部分人则惊于列强的“船坚炮利”，主张对列强妥协，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进行“自强”，这部分人就是通称的“洋务派”，其代表人物有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自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开办了一批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在洋务运动的30年中，清政府先后开办了19个军工厂。其中以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最为重要。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成立，到1867年，就已建成了十几个分厂，此外还有洋匠住楼、工匠住房、翻译馆和方言馆，成为清政府开办的十几个军火工厂中规模最大、经费比较充足的一个，是清军武器装备的重要供给基地。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在经营军用工业的同时，陆续建立了轮船、煤矿、冶铁、纺织、铁路、电报等多类民用企业。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这些企业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军工业燃料、材料和交通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利润，即所谓“求富”。

由于洋务运动的创办者是封建官僚，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张之洞在后来写的《劝学篇》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反映了他们当初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洋务派是封建官僚，他们引进西方技术，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巩固封建体制。洋务运动是在封建体制的框框里进行的。本来，这类近代军用、民用工业应具有资本主义特点，但是只要洋务派插手，不论是“官办”、“官督商办”，还是“官商合办”，几乎都成了封建衙门式企业，很少资本主义色彩。这就是洋务企业的封建性。又由于洋务运动是外国侵略者侵华政策变化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事事处处依赖洋人、具有半殖民地买办性特征。尽管有的兴办者不无摆脱外国控制的主观愿望，但封建官僚的腐朽本质，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摆脱对洋人的依赖。洋务派办的军工厂，不仅机械设备、原材料从外国运来，工程师、工匠从外国请来，甚至连执掌企业大权的正副监督也从外国“引进”。他们把办好洋务企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洋人身上。而外国侵略者是不会要中国自强的，洋务运动的致命弱点就在于此，这注定了洋务运动不会成功。

当清政府决定与列强合作，“自强求富”时，列强为了保证在中国攫取的各种权益得以实现，也改变了对华的政策，即由“打”变成了“拉”。极力扶持清政府，以便通过它来控制中国，因此，在自强运动的最初10年间，中外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相安时期，中国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但是洋务派所希冀的这种和平的国际环境并没有延续多久。从7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国家又纷纷觊觎我国领土，中国边疆地区普遍发生危机。在西边，俄国利用我国新疆发生叛乱于1871年出兵占领伊